

■本报记者 唐闻佳 李晨瑛

产科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
工作了几十年的华东地区某区域医疗中心产科主任叶湘(化名)猛然发现,产科似乎没那么忙碌了。与十年前相比,产科的月均分娩量降了近80%，“有时一天都等不到一名婴儿出生”。

“不再开展产科(平产、剖宫产)业务”。去年以来,伴随着这类公告,国内一些医院宣布停止产科服务。有人称此为“产科关停潮”。近来,妇产科专家、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教授段涛更是发出“救救产科”的声音。

产科关停潮的背后,交织着一系列错综复杂的经济、社会因素。从全国范围看,各级医院的产科其实面临着不同问题,基层产科遭遇“夹心层”的困境,头部妇产专科医院则发展乏力……

产科这一古老的学科,站上了一个生死存亡的十字路口。一个更现实问题是:产科还要不要发展?这个人命关天,“托举新生”的学科是否要有人、有体系来“托底”?

无疑,产科正在经历一场脱胎换骨式的新陈代谢。

日益强烈的忧虑:产科会不会重蹈儿科覆辙?

“忙!刚弄好几个危重产妇抢救。”近日,记者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见到产科主任金敏菲时正是中午时分,她刚下手术台,飞速回复着一串未读消息。

与外界观感不同,今年,新华医院的产科增量明显,从第一季度建卡情况看,比去年同期增加了75%。医院产科床位处于“约满”状态,要排队了。“可能是因为龙年,今年生孩子的不少。”在产科工作了30多年的金敏菲如是说。

不过,再看数据,新华医院产科的服务对象里,高危孕产妇超过70%,分娩数的50%来自上海之外的患者。这是因为,这里是上海的七大危重孕产妇救治中心之一。这也可以解释,不同医院的产科面临的“冰火两重天”现象。

据不完全统计,近一年,全国至少有十多家医院暂停或取消分娩服务。《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显示,2020年和2021年,全国妇产专科医院数量两次下降,到2021年时已跌破800家。

“运营成本太高,很多人看不到希望就走了。”叶湘所在的科室共27名医生,50岁以上的医生占比近半。“我们是实打实的‘老龄化科室’。”她说,近两年,科室里的一批中坚力量陆续离开,或在院内转岗,或前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另谋出路。

在此期间,头部产科的“虹吸效应”愈加凸显。准妈妈们都渴望“去大医院生”的观念,令基层产科更感寒意。

“看重技术的孕代会选择头部产



王炬亮摄

无关考核,无关收入,产科是一种公益属性极强的公共服务保障,而不是一门生意。

科,看重服务的会选择高端私立机构分娩,和他们比,我们没什么竞争力。”叶湘无奈地描述这种“夹心层”的困境。

“产科垮塌一定是从基层垮起,但基层又是无比重要的。从全国范围看,这是承接老百姓基本分娩需求的网底,网底不能破。”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儿科学院院长、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院长孙锡教授关注着产科的变化,他说,现如今,儿科医生不能隔岸观火,而是要有危机意识。

在业内,一种日益强烈的忧虑是:希望产科不要重蹈儿科的覆辙。“人口的趋势是波动的,曾经全国有过一波儿科关停潮,结果随着出生人口增加,要找儿科医生就找不回来了。医院重开儿科花了很多功夫。”孙锡还向记者强调一点:产科不是一个普通的学科,“产科不是管一个人,而是管两个人!”

“过剩”后的洗牌:产科儿科都“往前走一步”

其实,“头部产科”的日子也不

好过。

“即使是三甲专科医院,产科下滑的趋势也是存在的。”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最直观的变化是:“从前,孕妇总会问来医院后会不会睡走廊,现在问的是有没有单间。往日一号难求、建档难等现象,如今已不复存在。”

深层剖析,这也是一次产科发展“过剩”后的洗牌。在金敏菲的印象里,产科学发展有两个明显高峰:第一个是1980年代,第二个是2000至2010年间。在这两阶段时期,产科在全国蓬勃发展,妇保医院“遍地开花”。

“我们当时说笑话,产科一张床得睡4个人,两个孕妇一头一尾睡,各自肚子里还有一个孩子!”金敏菲回忆当时的新华医院产科“一床难求”。

“婴儿潮”之下,不仅各地医疗机构的产科蓬勃发展,民营医院的产科也风生水起,各种贵宾套间、花式套餐成为“紧俏货”。但也是在这些时期,全国诞生了一批低水平的产科,无暇思考学科深层次发展的方向。“现在,产科‘闭着眼睛可以挣钱’的时代结束了。”业内人士直言。

高歌猛进的发展时期,有人“往前走了一步”。比如,在沪上,一妇婴的段涛

教授、孙路明教授投入“母胎医学”尤其是胎儿医学领域的研究,孙锡则提出“宫内儿科学”。

“普通产科”要进一步发展,这是学科发展的国际趋势。并且,人口变化不是中国一家会遇到的情况。”作为小儿心脏专家,孙锡与记者谈到一个现象:他的门诊里,一半是孕妇,一半是婴幼儿。婴幼儿是来看先天性心脏病的,准妈妈准备爸爸来要一个准信——“B超说孩子有心脏病,这孩子还能不能要了?”

结合临床实践,孙锡认为,很多孩子完全可以“救下”,不用引产,因为是可治的。这也促成他在2009年主编的《小儿内科学》全国教材中修改了“儿科学”的定义,即儿科学是研究小儿遗传背景以及从受精卵开始一直到青春期的生长发育并促使其达到所有潜能的一门学科。儿科学的范畴由“新生儿”拓至“受精卵开始”。

如今,在新华医院,给子宫内的胎儿做心脏手术,并非稀罕事。在妈妈肚子里就接受了手术的小宝贝顺利降生,减少了出生缺陷,提高了新生儿的存活率。

这不仅是试图解决“胎儿生病了谁管”的科学问题,更是医学学科发展的趋势表现:产科、儿科都“往前走了一步”。与此同时,影像学、病理学、遗传学、内科

学、外科学等也聚拢而来。这些医生被统称为“给胎儿看病的医生们”。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提出了“产前儿科学”,医学界内部,也看到了类似的方向。

必须启动的转型:做强“顶板”做实“底板”

对“头部产科”而言,另一番变革也已经开始了。“我们的服务对象减少了,但服务难度却在提升,这也要求医院必须转型。”在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副院长顾蔚蓉看来,产科转型的根本在于医护的转型。

一方面,晚婚带来的高龄妊娠,孕妇产慢性病及自身免疫性疾病合并妊娠等愈加复杂的分娩情况,都是产科需要面临的现实难题;另一方面,孕妇对产科及孕产体验的期待更加多元。挖掘产科的需求,找到新增长点,亦是产科的重点任务。

“一胎分娩的体验感好了,孕妇产二胎甚至三胎的意愿也会更强烈。”顾蔚蓉介绍,今年,医院进一步升级了分娩环境,黄浦区产科楼全新启用。

眼下,不少头部妇产专科医院通过

整合全院医疗资源,将产科服务线延长。中国福利会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名誉院长程蔚蔚介绍,立足孕妇的切实诊疗需求,产科已先后开设早产中心、盆底中心等,并设立沪上三甲妇产专科医院中首个产科睡眠障碍门诊和新生儿家庭陪护病房,将诊疗服务贯穿产前、产时、产后的各阶段。

程蔚蔚表示,产科涉及预防医学,医护人员希望所有孕妇都能在没有并发症、不做手术的情况下顺利分娩;同时产科又是临床医学,手术量、手术级别等是不可避免的考核指标,“如何探寻两者间的平衡点,给予产科医护人员信心和力量,在当下,显得尤为紧迫和重要。”

在此期间,还有一则呼声日益强烈:产科的“本领”不能放!

“哪怕是很正常的孕妇生孩子,也有可能发生产后大出血、羊水栓塞、子宫破裂、脐带脱垂、胎儿宫内窘迫,更不要说那些有内外科合并症的高危产妇了。”段涛说,产科面对的风险很大,一旦有什么意外,就会引发较大的医疗纠纷。从运营以及安全的角度来讲,很多医院的院长不太想保留产科。一些医院迫于考核要求,只能留着,但会把科室规模收缩得很小。但科室缩小,业务量不够,医生收入待遇就会降低,这样的话就更难留住医生,最后形成恶性循环。

令叶湘印象深刻的是,科室曾有一名刚毕业的规培生,在产科规培了三年,却不愿留下,最终选择去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当全科医生。“去年,我们科室一个新人也没招到。产妇少了,年轻医生锻炼学习的机会也少了,没成长空间。”

产科若持续缺乏“新鲜血液”,一些产科技术也会逐渐流失。

“在不少人眼中,分娩是天经地义的事,大家的期望值都很高,可能不能让一名产妇成功顺产,是需要底气的。”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产科教授程海东说,包括臀位外倒转术、产钳术、双胎自然分娩助产、产道裂伤修补术等在内的产科技术,许多产科医生已经渐渐不掌握了。

“我将技术传给了我的学生,我安心了。可我的学生还能不能传给他们的学生?”程海东不敢想。

孕产妇死亡率和婴儿死亡率是国际上公认反映一个国家和地区国民健康水平和社会文明程度的综合指标之一。上海危重孕产妇、危重新生儿抢救成功率已多年位居国际先进水平。这背后,是一套体系的保障。

上海早在2007年左右就建立了覆盖全市的危重孕产妇救治体系,目前已有包括新华医院、仁济医院等在内的7家三甲医院成为危重孕产妇救治中心,24小时待命。在业内,不少专家达成的共识是:放眼全国,一方面需要有人承担起疑难危重孕产妇的救治工作,在一个区域内建立几家中心,这是“顶板”;另一方面,要有人承担基本产科的服务,这是“底板”,“底板”不一定要密布,但必须扎实。

“有一批人要储备着,有一群人必须托底。这无关考核,无关收入,因为说到底,产科是一种公益属性极强的公共服务保障,不是一门生意!”一名医学教授这样对记者说。

浙大本科生晒出学校寄给家长的成绩单引热议

给家长寄成绩单是“告状”还是良性互动

■本报记者 储舒婷

近日,浙江大学本科生在社交平台晒出学校寄给家长的期末成绩单,引发广泛热议。众多“同病相怜”的大学生对此表示“深感压力”,有人直呼“冒冷汗”。对此,浙江大学教务处老师日前回应称,部分学院确实会向家长邮寄成绩单,旨在保障家长知情权,“尽管学生已经成年,但考虑到学费主要由家长承担,家长对学生的学业状况应有知情权”。同时,这种寄送并非针对所有学生,主要针对成绩较差者。一时间,这一差异化选择引发新一轮讨论。

如何看待大学给家长寄成绩单?究竟是“告状”,还是家校间的良性互动?

“家校共育”还是侵犯隐私?

记者采访获悉,上海一些高校其实也有类似操作。那么,为何这些高校纷

纷选择将成绩单寄给家长?

沪上某大学相关负责人表示,通过这一方式让家长更了解孩子的学业状况,比如参考成绩进行升学规划,共同帮助学生成长。这也是高校对家校共育理念的实践。他举例说,此前向家长寄送成绩单时,曾有学生因为大学期间多门课程挂科,甚至导致无法按时毕业。对此,家长反映,学校有责任早点告知家长,避免造成如此严重的后果。

不过,这些举措遭遇不少大学生“吐槽”。有大学生直言,学校的直接寄送侵犯了隐私权。也有网友认为,这一做法削弱了学生的自主性和责任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学校和家长对成年学生的不信任。

对此,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学副教授汪晨波认为,大学生是成年人,应当具备独立的人格和对人生的自主掌控能力。因此,他不赞同向所有大学生的家长寄送成绩单的做法。在他看来,成年学生应学会面对现实并承担相应后果。

汪晨波也强调,家长和学校需要适时转变角色,更多尊重学生的独立性和个人边界。应当拒绝家长过度“包办”的思维。

监督学业和培养独立性并不冲突

随着近年高等教育强调“严进严出”,部分大学生由于缺乏自律,出现了学业成绩不佳甚至被大学清退的情况。那么,如何在尊重学生独立性的同时保证学生“不掉队”?

同济大学教育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张端鸿在接受采访时指出,尽管长期以来对学业的监督和学生独立性的培养存在争议,但这两者并不冲突。他强调,一旦大学生出现问题,学校应当及时向家长反馈,共同关注学生的学业进展。有些学校不选择寄送成绩单,而是采取学业预警机制,就是一种有效的沟通方式。他举例说,当学生出现一两门课程不

及格时,学校需要迅速采取措施,遏制其成绩下降的势头。相关统计显示,一旦学生累计不及格学分达到20多个,就很难挽回其学业。因此,一旦发现学生学业出现问题的苗头,学校应及时提醒,这是一种更负责任的态度。他认为,不能照搬国际上的一些做法,对学生完全放任不管。

张端鸿还谈到,中学时期,学生在较强的约束下成长;到了大学,部分学生可能无法很好地自我约束。因此,不能完全以保护隐私为由,否定学校正常的学业预警机制。学生、家长和老师,几方都应保持警醒、共同努力。

汪晨波也强调,对大学生应给予更多尊重。学生能否按时毕业,或选择延期毕业,都应得到理解、接受。“在这个竞争激烈的时代,我们要给予学生更多的松弛感,容忍他们试错。毕竟,过度的压力反而可能导致心理问题。因此,要以更宽容和合理的态度来对待学生,给予足够的成长空间。”

建长效机制破解废弃汽车处置难

程,真诚的决心是,一些复杂的、有争议的社区治理问题,单靠居委会劝说收效甚微,综合执法似乎是最有效的。另外,如果能召开针对具体问题的听证会,让大家坐在一起出主意,也能互相启发不断发现问题,居民区迫切需要搭建起这种解决问题的框架,促成各类问题就地尽快解决。

金诚说,其实每个居民心里都有讲公德这杆秤,但当触及个人利益时,思考问题就会相对带有个人主观色彩、相对片面,像“僵尸车”问题就是如此。“居民之间也应该互相宽容理解,提高公德意识,还要多学法律,才能把家园建设好。”

唐寅认为,培养居民们的规则意识很重要。“成功处置了‘僵尸车’以后,社区就立即着手制定了‘僵尸车’处置流程和居民公约,把经验固化成规则,这是司法服务触角延伸到基层一线的好处,能够为居民自治提供一个确定可行的方案,今天是处置

‘僵尸车’,明天也许就能解决楼道堆物。”

“作为法官介入‘僵尸车’处置时,能感觉到居民都是愿意听我释法的。”唐寅说,“这也给了我底气和动力,敢于挑战‘僵尸车’这种老大难问题。”

数字化,能否从源头助力

张军萍认为,接下来要破解“僵尸车”处理过程周期冗长、流程繁琐的痛点,建议厘清行政机关职责权限,运用数字化手段提高“僵尸车”的发现能力和处置效率。

相关部门能否进一步打通数据,推动各部门联动,缩短处置周期,让执法及治理资源尽快运转起来?譬如,可以利用图像识别、车牌识别等智能技术,对小区内车辆进行自动识别和分析。通过比对车辆年检情况、停车收费记录等信息,筛选出疑似“僵尸车”的车辆,自动推送至相关部门预警。

可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尽快找到车主并联系,也可通过平台发布公告或短信提醒等方式,提醒车主及时处理。

同时,相关法规政策也需完善,要明确“僵尸车”的定义、处理标准和主体责任等。加大对“僵尸车”处置的投入力度,提供必要的资金和技术支持。

“处置‘僵尸车’之所以棘手,因为这极大考验基层工作者的应对能力、协调能力。”刘剑川建议加强对基层工作者的培训和教育,让大家掌握法律法规、沟通技巧等专业知识;引导业委会等自治力量发挥更大作用,把“僵尸车”处置写入居民公约守则;加强相互学习交流,引入好的经验做法,互相推广借鉴,从而更高效地为居民办实事,清除各类社区隐患。

金诚希望借由更多成功处置“僵尸车”的案例,加强人民群众的法治思维和道德意识、责任意识,规范个人行为,共同抵制不文明与不作为。“要允许人们在思想上有一个逐渐提高认识的过程,通过正面引导、典型判例,给大家指明正确的路径。”

体彩公报	排列3第24093期公告	七星彩第24040期公告
	中奖号码: 9 3 5	中奖号码: 6 2 2 0 7 2 + 7
	直选每注奖金 1040 元	一等奖 1 5000000 元
	组选3每注奖金 346 元	二等奖 11 35963 元
	组选6每注奖金 173 元	三等奖 69 3000 元
		四等奖 2088 500 元
		五等奖 32008 30 元
		六等奖 1176745 5 元
		一等奖基金积累数: 283088850.54 元

公告
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政府于2022年6月17日就本区黄浦区建国东路71街坊旧城改建项目作出房屋征收决定(黄府征[2022]9号),地块征收补偿方案已于地块范围内以及政府网站予以公示。范围内有被征收房屋:永年路80-88号。
上述房屋被征收单位上海美京食品有限公司,法人代表胡培敏,征收实施单位至今无法与上述被征收房屋单位法人代表取得联系。
为此登报公告,请被征收单位法人代表自公告见报之日起30日内同本公司取得联系,配合协商房屋征收补偿具体事宜。公告期满后,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政府将依法按照征收补偿方案作出补偿决定。
公告单位:上海市黄浦第五房屋征收服务事务所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上海市黄浦区重庆南路37号 联系人:孙经理 联系方式:13371905760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郑海明与浙江民泰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签订的《债权转让合同》(编号MTYHSH-ZQZR-20230927-02),浙江民泰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合法拥有本人名下资产(包括债权及担保从权利),已依法转让给郑海明,浙江民泰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特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郑海明履行相关义务。								
郑海明作为上述资产的受让人,现公告要求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郑海明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或法院判决书所确定的义务。								
债权标的清单								
交易基准日:2023年9月15日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债务人名称	债权本金余额	利息	诉讼费、保全费	合同编号	担保方式	担保人	对应法律文书
1	章皖江、金日红	1392591.12	153311.63	13729.00	DK080920000059 DY080920000011	抵押	抵押人:章皖江、金日红 抵押物:上海市奉贤区望园路1588弄29号250室	(2023)沪0120民初6146号; (2023)沪0120执6183号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书约定为准。2.本公告清单仅列示至2023年9月15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及利息金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郑海明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行为能力,请相关债主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特此公告。								
出让方联系方式:021-34760335 受让方联系方式:13605867788								
郑海明 浙江民泰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